

中国“文化遗产学”研究文献综述

王运良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1)

内容提要:21 世纪初至今,“文化遗产”的概念日渐为国人所认识、接受并实践,与此同时,“文化遗产学”的建构不断为学者、业者所关注与探讨,蔡达峰、潘如丹、曹兵武、杨志刚、苑利、孙华、贺云翱、李志超、彭兆荣、徐高岭、李军、张廷皓等专家学者发表了诸多论著,探讨了文化遗产学的学科体系、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文化遗产的概念、文化遗产的保护等,有效推动了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建设与理论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文化遗产学 研究文献 综述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催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遗产”概念,1960年埃及阿斯旺大坝的兴建,使得拯救尼罗河岸阿布辛拜勒神庙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次世界性联合保护人类遗产的行动,进而促成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问世,从此,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日渐兴盛。与此相伴的是,关于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科学研究在西方也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诸如《遗产的管理 诠释 确定》、《遗产 旅游 社会》、《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欧洲遗产规划与管理》等众多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文化遗产学在欧洲几成一门显学。中国自从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特别是2004年苏州举办世界遗产大会,加之近几年的城市改造、新农村建设、旅游发展等,“文化遗产”迅速成为社会各阶层热议的话题,相应的研究机构、从业人员快速增多,大批的论文论著将关注的视角聚焦在了文化遗产保护之上。与此同时,不断有学者将学术的目光转向中国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建设探讨,诸如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体系等等,相应的学术活动也不断面世。短短的数年时间,我国关于“文化遗产学”的学术成果已有了相当积淀,对此进行回溯、梳理与反思,必会对中国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发展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我国最早以古代文物作为研究对象而形成一

门独立学科的是始于宋代、盛于清代的金石学,重在研究传世的古代青铜器和各类石刻,尤其偏重于铭文的著录和考证,以证经补史为核心目的;19、20世纪之交,殷墟甲骨、敦煌文书的现世揭开了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二十年后,周口店、殷墟等重要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这是一门通过发掘和调查古代人类的遗迹遗物和文献来研究、复原古代社会的人文科学;与此同时,随着南通博物苑的建立,中国的博物馆学开始兴起,其研究对象是自然标本与人类文化遗存的保存、研究和展示,以及博物馆功能及发展规律,旨在推动博物馆社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20世纪80年代以来,专家学者开始就建立文物学科的问题进行多方位的探讨,相继发表、出版了一系列论文、专著,如:顾颉耕先生的《建议开展文物管理学的研究》^[1]、王士伦先生的《试谈文物学》及《关于建立文物学的探讨》^[2]、殷德明先生的《关于建立文物学》^[3]、华源先生的《文物学研究综述》^[4]、孙机先生的《文物学刍议》^[5]、朱启新先生的《文物学是一门独立学科》^[6]、谭盛炯先生的《论文物保护学的基本对象和任务》^[7]、李晓东先生的《中国文物学概论》^[8]、张懋先生的《漫谈文物学建立的必要性》^[9]、蔡达峰先生的《文物学基础》^[10]、陈淳先生的《文物学、考古学及文化遗产保护》^[11]、吴诗池先生的《文物学概论》^[12]以及李

收稿日期 2011-05-04

作者简介 王运良(1968~),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博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遗产理论及管理、博物馆学。

晓东先生的新作《文物学》^[13]、梁吉生先生的《文物学发微——关于中国文物学的回顾与前瞻》^[14]、张继华先生的《从考古学看文物学的特色》^[15]等等。依据李晓东先生的见解,文物学的研究任务重在文物的基本要素、文物分类、文物鉴定、文物价值及文物保护管理。

进入21世纪,随着“文化遗产”理念在中国的日渐风行,原有的“文物”概念得到扩展,从学科角度审视这一新生文化事项开始进入众多学者的思维领域,2000年迄今,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不定期编辑出版了多辑《文化遗产研究集刊》,旨在构建文化遗产学科体系。继而,学界、业界围绕“文化遗产学”展开了各种讨论。

复旦大学蔡达峰先生指出,我们建设的是这样一门学科:它以“保护”为目的,以“世界的或人类的遗产”为对象,包括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在内,因而名之为“世界遗产学”比较合适,这样的学科揭示了“遗产”保护超越地区和时代的意义,比文物或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更大、更适合学科框架的建设,但显然,其中的许多概念是需要学科内涵的建设中逐步辨析和完善的^[16]。潘如丹先生也认为:世界遗产学应是一门涉及文物、景观学、艺术、建筑工程、城市规划、管理、经济学、法律法规等多学科交叉的新学科,但是“现在的世界遗产学尚在襁褓和构想之中,且不说学科体系,即使一般性的发凡起例的工作都几乎阙如”,鉴于此,应立足于文物学、景观学的融贯发展,着眼于民族文化,深化对世界遗产的研究,尤其需要从实证研究上升到理论研究,可见中国的世界遗产学任重道远^[17]。两位学者提出了建立涵盖更大范围、更具综合性的学科——“世界遗产学”的设想,不过这样一来,如何确立该学科的普适性方法论体系就是一个关键性的甚至根本不可破解的难题,因为自然科学方法论和人文社会科学具有重大区别。于是,更多的学者还是将目光聚焦在了“文化遗产学”之上。中国文物报社曹兵武先生认为,作为一门刚刚诞生的新兴学科,雏形中的文化遗产学首先是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文化遗产及其研究(主要是本体研究和价值诠释)、保护、管理、经营与传播分享;处理这些对象已经产生了许多严格的分支学科如考古学、博物馆学、管理学、保护科学等,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文化遗产学所包括的内容显然比考古学或博物馆学等任何一门单独学科都要大,也比它们简单的加法要复杂,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工日趋专门化,学科也越来越和具体的工作、职业结合在一起,文化遗产学就正

是这样一门应当和遗产价值及本体研究、管理、经营、运作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高度综合的创新性学科,其在本质上不是实证的、解释性的科学,而是建立在科研、对研究对象的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的实践性、管理性和经营性的科学^[18]。对此,复旦大学杨志刚先生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很难简单地将“文化遗产学”定位于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或管理科学,而是兼融这三个层面的若干内涵特点为一体,如果形成了一门成熟的学科,那它一定是既包含又超越于“管理性”和“经营性”之上的,一定有相当大比重的内容是超越“职业性”的,换言之,未来的“文化遗产学”应该是一门涵盖面甚广、学科交叉性很强的学问。同时杨先生认为:当前文化遗产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追求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学术创新,既要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和工作创新,也要通过理论创新寻求学术创新;并且要充分重视研究当代学科生长的规律和环境,立足于“问题”和“对象”的基础之上,通过系统的知识整合,在教学体系、研究体制和管理系统中得以全面地展现,从而为文化遗产研究的拓展创造条件^[19]。2006年,杨先生又进一步指出:从研究对象的层面上看,目前的文化遗产科学要重点关注五个方面的内容:文化遗产本体,包括历史、现状和可能的未来;与文化遗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环境、风貌、人类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生态等;文化遗产事业,包括管理、政策、法规的有关内容;文化遗产的价值及其应用;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文化遗产的相关学科建设,必须自觉地捕捉住这些“对象”,同时提炼“问题”意识,以“领域”内的实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并反馈和作用于“领域”^[20]。渤海大学的于富业先生认为:建立学理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学”,对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它是以研究前人创造、传承并保留至今的传统文化遗产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故同其它学科一样,也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并有不断扩大之势^[21]。该学者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景观、文献遗产、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列为“文化遗产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此说似可商榷,因为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的各种介质的珍贵文件,以及某项事件的口述历史的系统记录等,可以归类为可移动的物质文化遗产,而将文化景观视为一种不可移动的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共识,在西方,即便是以动植物等自然形态存在的各种园林景观、花园遗产等,也因其注入了诸多设计者及经营者的人文思考而被视为文化遗产。

由上而言,“文化遗产学”当是以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体及其环境的价值、保护和利用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院苑利先生曾经专门撰文详细论述了文化遗产学产生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及其独特的视角与视野。他指出: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56个民族的共存发展,使得中国的文化遗产丰富多彩,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厚资源,世界范围内的遗产保护运动推动了中国遗产事业的进程,但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化遗产研究截止到目前依然没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这种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严重削弱了中国遗产界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所以中国社会亟须这样一个学科,以满足社会对保护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需要,同时也可通过文化遗产学的建立促进中国文化遗产产业的整体发展;具有自身独特的研究视角与视野也是文化遗产学能够作为一门新学产生与存在的重要条件。与其它学科相比,文化遗产学在文化遗产研究这个问题上视角不但独特,而且更加专一,更容易在研究、保护文化遗产过程中发挥出其独到的功能。比如对于丽江古城,历史学家关注的只是其历史,民俗学家关注的只是其文化,建筑学家所关注的只是其建筑,而作为新型学科的文化遗产学所关注的则是它作为文化遗产的全部,不仅从全方位解读其文化精华,而且对其保护、民俗文化的传承以及文化遗产的活用等诸多问题,都会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对某一文化遗产所进行的系统研究是以往许多学科所未曾关照的。此外,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民间文学等诸多学科相比,文化遗产学还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学术视野,亦即它的学术视野仅局限于人类所创造文明中最为精华且保留至今的部分,那些普遍存在的大众文化,并不在本学科研究之列,如果从大处着眼,文化遗产大致可分为有形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三大部分,这同时也是文化遗产学的研究领域^[23]。北京大学孙华先生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研究文化遗产需要的是考古学和技术史、艺术史等专门史的学问(如果要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就还需要民族学、神话学和社会学的学问);保护文化遗产需要化学、生物学、建筑学、地质学、环境学、规划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的知识 and 技能;展示和利用文化遗产要的则是博物馆学、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管理学、规划学、建筑学等学科专家的参与。既然文化遗产事业需要的各个方面都有现成的学科,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建设“文化遗产学”这样的

新学科呢?^[23]孙先生的此一论断颇值思量,但是迄今鲜有学者呼应。2005年和2006年,《文艺研究》杂志组织了一个“文化遗产”研究的系列专题,相继刊发了李军先生的《什么是文化遗产?——对一个观念的知识考古》、《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理论模式的比较研究》以及冯鹏生先生的《取法绳理 昭德塞违——关于中国书画修复的问题》等文章,基于此,陈诗红先生认为:文化遗产学作为一门融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于一体的新学科,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但作为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一门年轻的学科,无论是对文化遗产基本理念的认识,还是对国际先进经验的借鉴,以及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总结和弘扬,都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24]。

南京大学贺云翱先生不仅长期致力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而且对于文化遗产理论也有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2006、2007年贺先生曾两度撰文对中国文化遗产学的相关问题进行详细论述。他首先通过追溯人类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历史探讨了文化遗产学成立的内在原因及其意义所在,指出中国“文化遗产学”的学术概念和体系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面临全球化的时势与背景,主动吸纳世界各民族的文明成就并结合中国的实际而作出的反应和创新性成果,建立学理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学”,对文化遗产事业的实践和理论都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接着,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景观”、“文化线路”、“产业遗产(农业、工业、商业)”、“文献遗产(世界记忆工程)”、“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等七个方面阐述了文化遗产学所具有的明确的研究对象,并对此进行了总括,认为“文化遗产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研究领域应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如文化遗产田野调查和研究方法,文化遗产资源及价值认定,与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利用相关的社会理论,文化遗产的相关法律研究等)、各类具体的文化遗产事项的研究(如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的时间、空间、结构、形态、内涵、功能、传承、演变、特征、价值、原真性、生存环境保护方法、利用形式等方面的研究)、文化遗产应用性研究(如文化遗产管理学、文化遗产保护的工艺、文化遗产科学保护技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国际体系、文化遗产的保存与陈列展览等)这三个大的方面;最后,论述了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地位、研究方法以及学科特性,指出“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定位应当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文理工兼备的交叉学科,

同时,其在学术实践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研究方法,如系统调查方法、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法等,其它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可为文化遗产学所充分借鉴乃至直接使用,也由此使得“综合性、贯通性、应用性”成为文化遗产学的最大特点。贺先生还指出:体现新的社会进步、社会需求和学术发展的“文化遗产学”已基本完成了内涵和学科体系建构,也逐步展现了诸多方面先进和新颖的学科理念,“文化遗产学”在21世纪的科学大家庭中必将拥有它的独特位置,并会日益表现出非凡的实践价值、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为此,首先要使“文化遗产学”在高校教学即人才培养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25]。这是我国迄今为止相关文化遗产学建构理论方面最为详尽且完备的论述。

中国科技大学李志超先生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了文化遗产的相关概念、文化遗产学的意义以及大学设立相应系科的必要性。他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第一特性,并具有强烈的历史传承性,“文化遗产”所谓的文化虽属狭义,但其保护和运用以及相应的经济产业开发仍是大事,在中国这样的历史文化大国,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将来必是“第一产业”。文化遗产学是文化学的分支,是传统史学、考古学、科技史学、公众教育学与现实的经济管理、文化管理等学科混融交叉的学科,是典型的文理交叉的学问,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大学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尽管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可以产业化,但是学校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不能提倡产业化^[26]。这是对文化遗产学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前瞻性认识。

厦门大学彭兆荣先生认为:遗产学并非单一的学科领域,参与遗产研究的学科很多,领域也很广泛,并由此出现了多种不同的遗产理论,诸如“共谋理论”、“动力说”、“延续说”、“资本说”、“认同理论”等等;同时,遗产已经越来越不像是个“既定物”,而是被赋予越来越多人为的因素,加入越来越多的行动色彩,以“遗产”为名的实践活动在近30年演变为一场社会运动,其内涵和形式、叙述与解释等相对于传统对遗产的认识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距离。进一步讲,由于当代大规模遗产运动的作用,遗产已经成为具有公共价值的“品牌”,累叠了许多与遗产“原生因素”不相干、甚至不相容的东西。因此,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和“保护”遗产之间构成了一对矛盾关系,妥善解决这对矛盾不仅考验我们的智慧,也考察我们的良知。换言之,当今遗产学视野下的“文化遗产”在本质上已与其本初相去甚远,需要审慎对待^[27]。无独有偶,重庆

文理学院刘壮先生也在文化遗产学科的视野下对文化遗产的本质展开了详尽的回顾与探索。他认为:作为一门学科,文化遗产学应当有自己区别于它学科的选择和伦理,这将是决定其能否独立存在的根本理由,如果不把文化遗产作为不同于其它学科的对象来研究,从方法学的角度来说就不会取得任何进步,因此,对核心概念“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过程,正是文化遗产学的学科选择和学科伦理的明晰的过程,因此,必须首先探讨文化遗产的本质所在。而面对文化遗产,尤其是在近于“累加”的内涵的发展过程中,当下的文化遗产,已然成为一个庞然大物,这令试图对其进行解读的后来者几乎无从下手,需要思考该如何开展研究才能真正切入文化遗产的本质。从现实情况来看,要走进文化遗产的本质,首先需要研究者从已有的理论范式中后退,使文化遗产从文化学经典对象的封神榜上走下来,成为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实现对文化遗产的“现象还原”,让现象回归现实,让遗产回归日常。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遗产学的学科起点并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或名录,而是在我们周遭时时演化不已的文化事象本身。由此,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命名,它不仅仅是面对过去的继承行为,还是面向未来的传承行为,它虽然是当代的事件,却保持着对过去的追溯和在未来的持续;同时,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标志,其认同与遴选也体现了各族群在文化认同方面独有的价值尺度^[28]。所以,深入探究文化遗产的本质是文化遗产学学科构建的重要背景之一。

中国文物报社曹兵武先生明确指出:文化遗产学应超越传统的文物学、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建筑学等学科,要融合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宗教科学,要充分应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成果,提炼关于文化遗产发现、认知、保存、利用与管理的科学理念与科学方法,从而构建起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理论体系^[29]。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嵩龄先生特别关注文化遗产领域外来术语,尤其是一些关键的“概念性术语”的翻译,并指出:如果说遗产科学是一座知识大厦,那么概念性术语则是大厦的梁柱,对它们的翻译不只是为了要求一般意义上的正确,而应精准,惟其如此,才能确保对国外遗产科学体系的理解不受丝毫扭曲,才能立足于中国特点、有所扬弃地进行中国遗产科学的创新。进而,徐先生专门撰文就“文化和自然遗产”、“复合遗产”、“静态遗产”、“系列遗产”、“遗产线路”、“文化景观”、“遗产地”等遗产类型,

“突出的普世价值”等标准,“原真性”、“原完整性”、“环景、环境”等保护原则,“重建”、“保护、保存”等保护方法进行了纠正性的翻译和阐释^[30]。

渤海大学崔向东先生认为:遗产事业已由一个纯粹的文化事业变为文化—经济事业,由此促使遗产产业、遗产经营、遗产开发与保护、遗产教育的出现,一门新的学科——“文化遗产学”应运而生,而且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文化遗产学离不开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古建筑学、博物馆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传统工艺学、管理学、旅游学,它是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具有十分鲜明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文化遗产学的开设符合教育部调整专业结构要求的“优势突出、特色鲜明、新兴交叉、社会急需”的原则^[31]。福建工程学院的李进先生则以遗产学为背景分析了目前中国图书分类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鉴于遗产学及其分支学科——文化遗产学和自然遗产学已经发展成为新兴的独立的学科体系,建议在目前使用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中原有类目下增加必要的类目注释,并增设遗产学或世界遗产学的二级类目^[32]。

除上述论文之外,国内以文化遗产学作为研究对象或命名的专著也相继出版,如《文化遗产学丛书:文化遗产报告》^[33]、《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论集》^[34]、《非物质文化遗产学》^[35]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关文化遗产学的论著将不断问世。

以上文献基本可以呈现当前我国“文化遗产学”的研究全貌,另外还有两种学术活动及学术成果应当引起整个文化遗产领域及业者的关注。

其一:围绕文化遗产学举行的专题研讨会。

据笔者统计,从2002年到2009年,全国以各种形式举办的有关文化遗产学的研讨会共有7次之多,分别是“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2002年10月)、“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学术讨论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实践研讨会”(2006年6月)、“中国高校首届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研讨会”(2008年4月)、“中国高校第二届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研讨会”(2009年5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学科建设高层论坛”(2009年11月)等。虽然这些会议多由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专家发起,但在每次会议上,“文化遗产学”都被屡屡提及,相关学科建设及课程设置探讨多次被列为主要议题之一。更令人关注的是,有的在会后还出版了相关论著,对中国文化遗产学的构建具有深远的意义。例

如,2008年4月在重庆文理学院召开的“中国高校首届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分设四个主题展开研讨,即“走进文化遗产学时代”、“世界遗产与中国”、“高校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与思考”,会后,徐新建先生主编出版了《文化遗产备忘录——2008·中国高校文化遗产学论坛纪实》一书,成为迄今为止我国学者探讨文化遗产学最为多面且翔实的一份文献^[36]。2009年5月在苏州大学举办的“第二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吴论坛暨中国高校第二届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同样将“文化遗产学的建立及文化遗产学如何进入课堂”作为重要的议题之一,中山大学宋俊华先生延续在重庆文理学院“中国高校首届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研讨会”的固定议题,重点阐述遗产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在建设文化遗产学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科学建设的客观性原则、独立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同时必须加强学科对象、学科理论和方法、学科体系建设等方面的研究,切实促进文化遗产学的构建。会后,同样出版了以此次会议内容为主体的《东吴文化遗产》(第三辑)^[37],为我国文化遗产学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文献成果。

还须一提的是,2007年4月13日,中国文物研究所(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邀请相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以文化遗产保护学科体系、文化遗产保护学科理论架构、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发展方向为主题举行了座谈会。时任所长的张廷皓先生认为: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应以文化遗产保护为研究对象,包含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体系、价值保存体系和价值实现体系。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文化遗产学科的提出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而目前,文化遗产学科建设非常滞后,应给文化遗产一个完整的概念,要将其纳入国民教育范畴。学者们认为:文化遗产学的研究对象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大致包括文化遗产学理论、文化遗产法学、文化遗产美学、文化遗产管理学、文化遗产保护学、文化遗产环境学、文化遗产教育学、文化遗产经济学等,是与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并行不悖的,其方法论独具特色,是新的学科增长点。

其二:围绕文化遗产学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

2007年3月的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张廷皓先生向大会提交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建设的议案》中提出:文化遗产学科是为数不多的涵盖面较广的学科之一,应当成为国家培育

和扶持的对象,但就目前而言,该学科建设滞后,严重影响着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特别是科研水平总体偏低、科学理论支撑能力不够、人员科学素质普遍不高、技术瓶颈长期存在、与科研院所及高校缺乏学科纽带等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故此有必要将文化遗产保护学科作为一个学部纳入中国工程院学部序列,将文化遗产保护学科的教材纳入教育部国家重点教材编写计划,将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结合起来。

2008年3月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张廷皓先生再次提交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学科建设的建议》,指出: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属于基础性工作,是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发展的核心,直接关系到文化遗产保护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然而,我国的文化遗产学科建设的滞后性现状严重制约了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和文化遗产保护科技的发展,因此,国家相关部门有必要设立文化遗产学科建设专项资金,围绕国家文化遗产保护需求和学科发展前沿,构建文化遗产学科结构;教育部应将文化遗产学科建设体系纳入国家学科建设体系和教育系统,支持高等院校及其他科研机构设立文化遗产学科的硕士点、博士点;人事部应支持高等院校及其他科研机构设立文化遗产学科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或科研工作站),培养高层次人才。

在2009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张廷皓先生第三次提交了《加强文化遗产学科建设》提案,指出:学科建设是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发展的核心、基础和关键,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应设立文化遗产学科建设专项资金,制定文化遗产学科建设规划,并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生源、课程设置、研究生及博士后站点等方面提供支持,应出台文化遗产高层次人才引进优惠政策,支持文化遗产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等工作。

综上所述,随着文化遗产运动在全国的勃兴,关于文化遗产学的探讨一直未曾中断。然而,尽管有了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与积极的探索活动,目前我们依然难以从一门独立、成熟学科的角度分析文化遗产学科彻底建构的可行性,但是无疑,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在当今尤其需要科学的理论体系及蕴含其间的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何谓“科学”?简言之,即以实践为基础,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本质及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以此论,当代中国学者对文化遗产价值与作用的认知、保护与利用原则的确立、保存与维护手法的采用以及文化遗产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显然

正在构建一种较为严密的知识体系,此实为文化遗产学之基石所在。

彭兆荣先生曾经论述道:遗产热、遗产运动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活动和重大事件,并演变成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对遗产的认识和实践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知识体系——遗产学:一门既关乎历史又关乎现实的学科,之于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五十多个民族的国家来说,我们拥有古老、丰富的遗留和遗存;但之于我国的学科和学术研究来说,遗产学却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截至目前,我国学术界对遗产学,尤其是对其所涉及的理论、批评以及复杂关系的研究相对滞后,对一些学理方面的问题研究甚少,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关乎遗产学的理论方面,对我国现实所进行的遗产运动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38]。故而,依笔者之见,方兴未艾的中国文化遗产运动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就必须进一步加紧建构科学的理论体系,推动文化遗产学的早日成型、成熟,舍此,实无它途可寻。诚如杨志刚先生所言:围绕文化遗产“领域”而生发的相关学科建设的种种冲动,从本质上看,是真切的,而非虚妄的,关键在于,对于这样一门新兴的学科,该如何型塑,包括对已有的若干学科如何进行交叉与整合,以凝炼出一个新的系统。2004年6月,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在《中华遗产》发刊词中说得好:保护遗产“是20世纪人类最富历史智慧的行动之一”,因之,中国文化遗产科学的学科建设,也需要拿出我们的群体智慧^[39]。

[1]顾颉耕:《建议开展文物管理学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

[2]王士伦:《试谈文物学》、《关于建立文物学的探讨》,《浙江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

[3]殷德明:《关于建立文物学》,《中国文物报》1985年10月18日。

[4]华源:《文物学研究综述》,《中国文物报》1985年10月18日。

[5]孙机:《文物学刍议》,《中国文物报》1988年7月29日。

[6]朱启新:《文物学是一门独立学科》,《中国文物报》1988年7月29日。

[7]谭盛炯:《论文物保护学的基本对象和任务》,《中国文物报》1988年10月1日。

[8]李晓东编著:《中国文物学概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9]张懋:《漫谈文物学建立的必要性》,《光明日报》2000年9月7日。

[10]蔡达峰:《文物学基础》,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编著《文化遗产研究集刊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11]陈淳:《文物学、考古学及文化遗产保护》,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编著《文化遗产研究集刊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12]吴诗池:《文物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
- [13]李晓东:《文物学》,学苑出版社2005年。
- [14]梁吉生:《文物学发微——关于中国文物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7年第1期。
- [15]张继华:《从考古学看文物学的特色》,《平顶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 [16]蔡达峰:《世界遗产学的研究对象与目的》,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编著《文化遗产研究集刊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17]潘如丹:《中国的世界遗产学任重道远》,《文汇报》2004年9月19日。
- [18]傅兵:《文化遗产学:试说一门新兴学科的雏形》,《中国文物报》2003年5月30日。
- [19]杨志刚:《文化遗产研究与“文化遗产学”》,《中国文物报》2003年9月12日。
- [20][39]杨志刚:《文化遗产科学的学科建设及其“对象”问题》,《中国文物报》2006年8月18日。
- [21]于富业:《文化遗产学研究对象分析》,《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 [22]苑利:《文化遗产与文化遗产学解读》,《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 [23]孙华:《文化遗产“学”的困惑》,《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5期。
- [24]陈诗红:《文化遗产学与〈文艺研究〉》的新视点——理论与实践的尝试》,《中华读书报》2006年3月29日。
- [25]贺云翱:《文化遗产科学初论》,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孝陵博物馆编《世界遗产论坛(二)——世界遗产与城市发展之互动》,科学出版社2006年;《文化遗产学初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 [26]李志超:《文化遗产学的基本概念及大学责任》,《教育与现代化》2007年第9期。
- [27]彭兆荣:《遗产学与遗产运动:表述与制造》,《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
- [28]刘壮:《论文化遗产的本质——学科视野下的回顾与探索》,《文化遗产》2008年第3期。
- [29]曹兵武:《中国特色文化遗产理论体系刍议》,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孝陵博物馆、南京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会编《世界遗产论坛(三)——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世界遗产事业》,科学出版社2009年。
- [30]徐嵩龄:《文化遗产科学的概念性术语翻译与阐释》,《中国科技术语》2008年第3期。
- [31]崔向东:《最古老的事业 最年轻的学科——关于文化遗产学专业与学科建设的思考》,《渤海大学学报(电子版)》2009年第9期。
- [32]李进:《关于遗产学文献的分类探讨》,《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2期。
- [33]顾军、苑利:《文化遗产学丛书:文化遗产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 [34]陶立璠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论集》,学苑出版社2006年。
- [35]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 [36]徐新建主编:《文化遗产备忘录——2008·中国高校文化遗产学论坛纪实》,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
- [37]苏州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编著:《东吴文化遗产》(第三辑),三联书店2010年。
- [38]彭兆荣:《遗产反思与阐释》,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页。

A Literature Review of Culture Heritage Studies in China

WANG Yun-li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en increasingly understood, accepted and practiced by Chinese people. Mean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has caught increasing attention and been extensively explored. Through their vast publications,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CAI Da-feng, PAN Ru-dan, CAO Bing-wu, YANG Zhi-gang, YUAN Li, SUN Hua, HE Yun-ao, LI Zhi-chao, PENG Zhao-rong, XU Song-ling, LI Jun, and ZHANG Ting-hao have made extensive discussions of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discipline including its system, nature, object of study, research methods as well as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ts protection, which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building of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Key words: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literature; review

(本文终校:毛 颖)